

老北京的商市

张双林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有趣的北京商俗	(1)
一、钟鼓楼前商事浓	(1)
二、巧用街市为路名	(6)
三、“会馆”“商会”本一家	(10)
四、货声悠扬入深宫	(16)
五、摊商小贩成大器	(21)
六、京人难进老字号	(25)
七、同行并非是冤家	(30)
八、燕商惧怕“鬼门关”	(34)
九、燕市旧日多恶霸	(39)
十、坑蒙拐骗在当年	(44)
十一、旧京曾有“粮老虎”	(49)
十二、商贾禁忌何其多	(54)
十三、一股高香祭号神	(59)
十四、市场亦是古刑场	(65)
十五、不祥火神降闾闾	(70)
十六、京商踊跃抗日寇	(74)
第二章 丰富多彩的北京商业文化	(80)
一、自古京华有广告	(80)
二、幌子高低店铺排	(85)

三、京城牌匾冠中华.....（ 91 ）

四、店铺字号求文雅.....（ 95 ）

五、燕市高唱《竹枝词》.....（ 100 ）

六、一岁货声是吆喝.....（ 104 ）

七、精联妙对竞相辉.....（ 109 ）

八、姓氏亦可做商标.....（ 114 ）

九、俚语俗话文章多.....（ 119 ）

第三章 百家行当汇京城.....（ 125 ）

一、珠光宝气古玩业.....（ 125 ）

二、金融一业定乾坤.....（ 129 ）

三、四牌楼下卖估衣.....（ 134 ）

四、瓜果香飘四九城.....（ 137 ）

五、满汉饽饽皆上品.....（ 143 ）

六、长安街上饭菜香.....（ 148 ）

七、茶庄茶馆竞峥嵘.....（ 153 ）

八、难忘昨日大酒缸.....（ 157 ）

九、“ 棚壁生辉 ” 首饰楼.....（ 162 ）

十、“ 一槌定音 ” 拍卖行.....（ 166 ）

十一、棺材寿衣各 “ 千秋 ”（ 170 ）

十二、谈今说古话当铺.....（ 176 ）

十三、小巷幽幽响鼓声.....（ 180 ）

十四、闲言碎语说洋行.....（ 186 ）

十五、洋行说罢说洋庄.....（ 191 ）

十六、听卖街头茉莉花.....（ 195 ）

十七、京花五色人前夸.....（ 201 ）

十八、长安市上好觅书.....（ 205 ）

十九、艰辛历尽劝业场.....（ 211 ）

第四章	燕市杂拾.....	(217)
一、	“ 臭名远扬 ” 王致和.....	(217)
二、	东西两庙货真全.....	(222)
三、	喜气洋洋年货摊.....	(227)
四、	小铺温馨暖万家.....	(233)
五、	“ 分号 ” 亦是 “ 连锁店 ”	(238)
六、	酒香不怕巷子深.....	(240)
七、	无本生意能赚钱.....	(245)

第一章 有趣的北京商俗

一、钟鼓楼前商事浓

北京最古老的商业区在哪儿？不少人很自然地想起前门大街、花市和大栅栏街。其实，北京最古老的商业区在今天的钟楼、鼓楼一带。

北京最古老的商业区是在元朝形成的。虽然在辽、金时代，北京也一度做过京城，但毕竟是“陪都”的地位。况且，城址历经兵火和变迁，很难再从散佚的史料中查找京城商业区的记载，而钟鼓楼一带，至今尚保留着古老商业区的规模和形制。

元代，北京称为大都，元代统治者称之为“汗八里”。由于这里是元朝的国都，也是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元世祖至元九年（1272年）忽必烈下诏，将金中都更名为大都，至此，大都开始进入鼎盛时期。全国各地以及外国的许多商品货物都集中到这里，“东至于海，西踰于昆仑，南极交广，北抵穷发，舟车所通，货宝毕来。”（见程钜夫：《姚长者传》，《雪楼集》卷七）。

在元大都的街头，尤其是钟鼓楼地区，随处可见来自高丽、交趾、波斯及中亚西亚和欧洲的商人。当年，来华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看到大都街头的繁华景象十分慨叹，

他称元大都是世界上的“商业繁荣之城”，“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力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见《马可·波罗游记》）。

大都的商业中心，即是钟鼓楼一带。这里形成商业区的原因有二，一是这里是大都城的中心；二是这里是漕运码头。

我国营建国都的哲学思想来自古代的《礼记》，特别强调“前朝后市，左宗右社”这一传统布局。元大都的宫城在城南，而钟鼓楼商业区在城北，符合“前朝后市”之说。

元代的鼓楼称为“齐政楼”，元《析津志》载云：“齐政楼，都城之丽譙也”，“此楼正居都城之中”；钟楼在鼓楼的北面。在正方形的元大都城中，钟、鼓楼确实是城的中心，因而这里是元大都“富庶殷实莫盛于此”，鼓楼“东南转角街市，俱是针铺”，楼西“率多歌台酒馆。有望湖亭，昔日皆贵官游赏之地”。楼的左右“俱有果木、饼面、柴炭、器用之属。”（见《析津志》）。

作为大都城的中心，形成商业区的原因还有距离漕运码头最近。在交通不便的古代，水运是最便捷的。元大都的西北是“海子”积水潭（今称后三海，即什刹海、后海和积水潭），恰好为水运提供了良好的场所。积水潭在元代时的面积是很大的。元朝定鼎大都后，大都成为全国中心，但是江浙一带在经济上仍处于重要地位，南粮仍需北调，南方的湖广杂货、土特产仍需北销。为解决漕运的问题，在科学家郭守敬主持下修筑了通惠河，并引西山诸泉水入积水潭（值得一提的是，今日的京密引水渠就是沿郭守敬早年引水渠遗址而建）。除通惠河外，还开凿和修治了通州运粮河、御河、会通河等运河，这些运河和江南的运河相接，并与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互相贯通。与此同时，元代还

开发了从海上到大沽，再转运大都的海运航线。水运的发展，促使了北方，尤其是大都城的经济的发展。

元代的积水潭，被人称为“北京的古海港”，当时，在宽阔的水面上停泊着大批从江淮驶来的漕粮船和货船，元人在《大都赋》中说：“扬波之橹，多于东溟之鱼；驰风之樯，繁于南山之笋。一水既通，万货如粪。”积水潭上的繁华场面，使人产生了“舳舻遮海水，仿佛到方壶”的慨叹。

如此繁华的水运码头，又是市中心，这里形成商业区是很自然的。

由于在元代钟鼓楼一带就形成了商业区，800余年来，经久不衰。至今，在北京还有“东四、西单、鼓楼前”之说，可见这一带的商业区在北京城是得到公认和肯定的。

明初，因战乱兵火，北京“商贾未集，市廛尚疏”，钟鼓楼一带曾有过短时萧条。但是自从将中心阁、齐政楼改建成钟、鼓楼之后，这里是京城报时的中心，在“晨钟暮鼓”声中，商业区又复苏了。各地商人又云集于此，一些商号又重新开业，钟鼓楼地区又恢复了繁华。

明代之初，什刹海的水路码头的作用仍然存在，明后期逐渐失去了作用，但由于陆路交通的发展，对此地的商业影响不大。尤其是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商人频繁出入京城，而他们又多喜欢居住在德胜门、安定门附近，鼓楼一带很自然是他们买卖的理想场所。

清代，钟鼓楼地区的商业仍在京城占有一定地位。那时，水路码头已不存在，但是什刹海一带形成了园林风景区，一些著名的王府，如恭亲王府、醇亲王府、成亲王府、蒙古罗王府等等均建在附近，一些私家园林也在此修建，一时间成为达官贵人云集的地区。这些“贵族”生活豪华，开支巨大，

无意中使鼓楼一带的商业畸型发展，像烟袋斜街里就出现多家饭庄、烟铺、茶馆、浴池；鼓楼大街上日杂百货、布疋丝绸、食品烟酒、茶叶诸店都出现了兴隆红火的局面。这里并没有因前门、大栅栏商业区的出现而受到影响。像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描述的恒舒当铺，老舍在《茶馆》中描述的裕泰大茶馆，其原型都在鼓楼附近可以找到。今天，在地安门外大街（鼓楼前大街）52号，有一铺面房坐东朝西，建筑面积达380平方米，门面有三间，雕镂细致，彩绘新颖，门面楼后面还有后楼、仓库和帐房。据说，这里原是一家大绸布店，虽历经百年之久，但今天仍然可看出当年的规模之宏大。

民国之后，尤其是“国都南迁”之后，对北京地区的商业是个严重的打击，致使昔日的“京都”百业萧条，像南城的“七大居”、“八大祥”、“长安十二春”、“八大楼”等驰名京华的“老字号”都受到了影响，不少商号歇业倒闭，惟有钟、鼓楼一带仍保持着昔日的繁荣。其主要原因是这里店铺、商号多以经营中低档货色为主，平民色彩极浓。同时，当时的市政当局又将鼓楼改为“明耻楼”，举办展览，开设电影院，招来不少顾客和观众，并在钟、鼓楼之间办了游艺场和平民市场，一刹间游客如云，使得这个古老的商业区维持了下来。

日伪时期，钟鼓楼商业区终于凋零了。据1939年1月18日的《晨报》所云：北平“由阳历去年十月至十二月共有一千六百十六家之多”的店铺歇业，并发生了“长此以往，北京市面将不堪设想矣”的哀叹。这些倒闭歇业的店铺中，有不少就在钟、鼓楼一带。如，济生药房、利顺兴羊肉铺、义记理发馆、吉升切面铺、双合顺理发馆等等。1944年5月18日的《晋察冀日报》曾如实报道了当年北京商业衰败的惨状：“乞丐充满着街头巷尾，卖小吃的饭摊早已绝迹，大饭馆都已

安上了栅栏，小饭馆整天关着门……”这些描述也是那时钟、鼓楼一带的写照。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之后，在1945—1946年间，钟、鼓楼商业区一度又有所恢复，但是这不过是“回光反照”而已，很快由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所取代，又有一大批商号“关门大吉”，整个地区又萧条起来了。

在钟、鼓楼地区，昔日不少驰名中外的老字号，虽然它们的知名度略逊于同仁堂、六必居、瑞蚨祥这样的老店，但是，在北京商业发展史中，仍占有一定地位。如，会贤堂饭庄、望湖楼饭庄、庆云楼饭庄；烟袋斜街里的同台盛、双盛泰烟具店（据传，此二店曾给慈禧太后洗过烟袋）等等。这些老字号在解放前相继停业，没有了这些老字号，钟、鼓楼地区的商业大为减色，显得十分冷清了。

解放后，尤其是改革开放的十余年来，因政通人和、百业俱兴，这个地区又复苏、繁荣起来，在近二三年来，已达到空前未有的繁荣。从地安门至鼓楼脚下，长不足300米的街上，分布着百余家大小商店，个个生意兴隆。如今，一些老店，像吴肇祥茶庄、宝聚斋古玩店、合义斋饭馆（专营炒肝之类小吃）、金和祥饭馆等等，至今不衰。与此同时，这个地区还“内引外联”，扩大经营，诸如什么“牛仔屋”、利达斯、真维斯之类的服装店均在此落户。旧日此地区金银首饰店颇多，今天，在这里又有泉民、福鑫、京银、万万等店在此营业。一些外地迁京的饮食店，像马凯餐厅（专营湖南菜肴）和狗不理包子铺，以及什么加州牛肉面之类的铺户，生意亦十分红火。

推陈出新是钟鼓楼地区的一大特色，昔日那些大小店铺近年都易名重新营业，五花八门的字号，让人目不暇接。尤

其是在这个地区还有像地安门副食商店、地安门百货商场、鼓楼电器公司等等中型商场。这三家均在北京独树一帜，被认为是“信得过”的“百家最佳零售企业”之一。每天顾客如云，人流不断。黄昏后，华灯初上，在长街上还有“夜市”，供应各类小吃、服装百货，熙熙攘攘，热闹非凡。

北京最古老的商业区，只有今天才真正焕发出光辉夺目的色彩。它忠实于历史传统，而又不拘泥于传统；它有现代商业街的气息，又有古老的京城风韵。总之，它在历史的积淀的基础上，创造美好的未来。

二、巧用街市为路名

在北京，旧日有“一步三市”之说，市场之多，令人瞠目。

然而，随着岁月沧桑变化和市政变迁，有许多市场已经消失，有的至今尚有往昔的余晖，但更多的则保留在街巷地名中。地名，被人们誉为人类历史的“活化石”，这些保留在街巷胡同名称中的市场，给人们研究北京的商业史积存了宝贵资料。

北京是五朝古都，它的城建规划在历史上一一直遵照“前朝后市”的古老思想。因在皇城的后面建市，明中叶后建外城，外城后来也成了市场云集的地方。自古以来，京城贸易发达，四方之货集于城内，种类相同的货物，往往汇聚在一起出售，形成了一些以市场命名的街道。据考，此俗在元代即盛，明清两朝又有所发展，北京以市场命名的街巷胡同，大多始于明朝。

北京内城东部以东四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市场网络。东

四牌楼上曾书有大市街字样。牌楼西称猪市大街，简称猪市，在元代，曾称东马市大街，今日称东四西大街。

猪市大街当年是京东诸县生猪的集散地，在这条街上曾有数十家猪店及猪肉杠（肉铺）。猪市的猪大多从京东而来，猪贩子步行赶猪至小猪店村（今朝外小庄）打尖休息，在天黑关城门前进城，便在猪市大街的猪店里交易。交易后，猪贩子则住店休息或“打道回府”，肉杠连夜将生猪一一宰杀，第二天清晨便出现在肉案子上。这种“程序”一年复一年，直到本世纪50年代初期，才因卫生等原因而终止。

猪市大街不仅有生猪市场、猪肉铺，而且还有“深加工”的熟肉店铺，旧日有普云楼、振阳楼诸号，专卖酱猪肉、香肠等肉食品。在几十年前，猪市大街及街上的豆腐巷胡同，不少院门口挂有一串串白色猪尿泡，即是猪店的幌子。

在猪市大街上，旧日有小羊市、大鹁鸽市等，街西北有马市大街（今美术馆东街）。从东四十字路口往南，有灯市口、米市大街等地名，而昔日确实是繁华的市场，其中尤以灯市称著。灯市的记载至少可以追溯到明代，《燕都游览志》中说：“灯市在东华门王府街东，崇文门街西，亘二里许，南北两廛，凡珠玉宝器，以逮日用微物，无不悉具。衢中列肆，碁置数行，相望俱高楼，楼设氍毹帘，为宴饮地。一楼日赁值有数百缗者，夜则燃灯于上，望如星衢……鬻灯在市西南，有冰灯，细剪百彩，浇冰成之。”其它一些史料，也有灯市的记载，足见灯市并非徒有其名。

不过，灯市的好景不长，正如光绪《顺天府志》所云：“明灯市最繁盛，范景文诗所谓‘文贝珊瑚看不尽，东华门外市三条’也。今灯市、肉市俱废，其地犹存灯市口之名。”

西四牌楼昔日也有大市街之称，西四十字路口东旧称西

马市大街，西边为羊市大街，南部为缸瓦市，附近还有大酱坊、羊肉胡同等与市场有关的街巷。

马市大街（今西四东大街）旧日不仅是马匹交易市场，在明代还曾是古刑场，又称西市。马市大街是根据古人“刑人于市，与众弃之”的说法，设立的刑场。

旧北京市内不少马骡驴市场，东四、西四有马市大街，而且还有驴市胡同（今称礼士胡同）、南、北驴市（今称南、北礼士路），南城有骡马市大街、羊市口等牲口市场。

牲口市场存留在人口稠密的市区，有碍卫生，又不雅观，自民国后逐步迁外郊区，但是留下了永久的纪念——地名。

北京南外城是明中叶后新建的，故不大受“前朝后市”的影响，各类市场就更多了。崇文门外有蒜市、晓市、榄杆市、糖市、磁器市、花市等等，在旧日这里都是繁华市场，今日则是街巷名称。

宣武门外亦如此，这里有菜市、米市（米市胡同）、骡马市、牛街等等。前门外以市场为命的街巷更多，如果子市、肉市、布市（布巷子为今称）、铺陈市、煤市、钱市、粮市（粮食店）、珠宝市、鱼市（今鲜鱼口胡同）、猪市（今珠市口）等，难以枚举。

前门外珠市口，最早是猪市，后让位于东四猪市，后因“前后左右，计二三里，皆殷商巨贾，列肆开廛，凡金绮珠玉以及食物如山积。酒榭歌楼，欢呼酣饮，恒日暮不休。京师之最盛华处也。”虽猪市改称珠市，仅一字之差，但这小小的改动，不仅标志着此地质的变化，同时也记述了此地的沧桑巨变。

前门外的肉市，今日仅为一小胡同，从这里早已看不到昔日的繁华热闹了。这条与繁华的前门大街平行的小巷，在

历史上一度十分兴盛，热闹无比：“高楼一带酒帘挑，笋鸡肥猪须现烧，日下繁华推肉市，果然夜夜似元宵。”在肉市这条小巷中，还有一件在中国商业史上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京城老字号全聚德烤鸭店就是在此起家、兴旺而发达的。

前门外正阳门大街两侧及南部，以市场命名的街巷最多，而且还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十分耐人寻味。如大街西侧的那条南北小街，最北称珠宝市，尔后称粮食店，再往南则称铺陈市。所谓铺陈乃破布烂衫，过了铺陈市就是天桥了，这种由“富”到“穷”的变化，真实地记述了当时的商业布局，很有意思。

天桥是旧京的缩影，这里不仅是什么“八大怪”自由驰骋的杂耍场，也是嘈杂的市场，因而这里以市场为名的地方不少，如天桥大街东侧有东市场一巷、二巷等地名，旧日这里曾是木器市、估衣市；西侧有西市场、公平市场等地名，正如《天咫偶闻》所云：“天桥南北，地最宏敞，贾人趁墟之货，每日云集。更有金张少年，扶风豪士，夕阳未下，黄尘正繁，轮雷乍惊，驹电交掣，飘风一过，忽已远逝，洛阳青门之犊，不足斗其捷也。”

今天，天桥已成为陈迹，但一些以市场为名的小巷至今尚存，为好事者聊补“天桥梦”提供了一个好的地理轮廓。

北京以市命名的胡同街巷，并不是像给小孩子取名小狗子、二秃子、三丫头、四妞儿等随口乱叫，然后约定俗成的，它一般都有具体内容，并不是人们随意叫的。在此类以市场为名的街巷胡同中，有的很具体、直露，有的则有些含蓄，但不抽象。旧日在宣武门外有一小巷称司家坑，民国后称司家坑浮摊，这里原是一些小货摊儿云集的地方，小货摊儿京人又称“浮摊”，天长日久人们习惯称司家坑浮摊，“文革”后

方改称定居胡同。

以市场为名的街巷中，有的还有几个名称，但指的都是一地。如崇文门外有东晓市，又称东小市，还有人称此处为“鬼市”，虽称呼不一，但此处有“市”则无可置疑。前门外的铺陈市，又有穷饭市、穷汉市、补拆市等名，与东晓市一样，虽叫法不一，但都没有脱离开“市”。

随着时代的变化，北京旧有的一些以市场命名的街巷，也因种种原因而“更名改姓”，如今日天坛附近的更生胡同，原称裕褱市，也有裕褱店之称。当年此处居民多以“打裕褱”（做布鞋原料）为生，后形成了“专业市场”，天长日久，便有了裕褱市的名称。前外纸巷子是昔日纸店众多的地方，“文革”后，将纸巷子并入了煤市街。

以市场为名的街巷，有些是重名的，如果子市，北京至少有三处，分别在前门外、德胜门内和宣武门外（今称果子巷）；草市有二个，一个在天坛北，称西草市，另一处在广渠门内称东草市。京城还有多处叫“草厂”的地名，这些与草市没有多少关系，草厂主要是存放草料的地方。

北京的胡同街巷名称，是无比丰富、包罗万象的“大百科全书”，而以市场命名的街巷胡同则是这部“大百科全书”中最有意思的一章，也是研究北京地区商业史、商业文化不可少的资料。

三、“会馆”“商会”本一家

北京是商业十分发达的城市，但是，所谓真正的“北京人”经商的则是凤毛麟角。在历史上，经营绸缎、布匹、粮食、猪肉、饭庄、估衣等行当，大多掌握在山东人手里；经

营钱庄、票号、典当、杂货等行当，大多掌握在山西人手里。至于“南北山货”、“湖广杂货”等行业也掌握在非“北京人”手里。

在这种特定的环境和形势下，外省商人必须团结起来，以利于竞争。而团结起来就必须有自己的一个“领导核心”，于是，各类会馆应运而生。

会馆，原本是外省人为进京赶考的举子、进京述职的官员、进京经商的商人饮食起居的“招待所”，尔后逐渐演变成同乡或同业人的组织。由最初的“以敦亲睦之谊”的同乡会馆，变成了有利于同业竞争保护自体利益的机构——工商会馆。

北京的会馆的历史至少可追溯到明代，清代一度十分发达，最多时有会馆300余所。清末废除科举制后，京城的会考停止，赶考举子就没有了。这样，会馆中一部分成了商人集会和议事的地方，慢慢地演变成纯粹的工商会馆。当然，也有的会馆在建立之初，就有工商会馆的性质、目的和作用。

关于此类会馆，在史籍中有所记载，如《旧京琐记》云：“京师瓦木工人，多京东之滦、蓟州人，其规颇严，凡属徒工，皆有会馆。”在当时，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行会，而行会议论“公事”的地方，就选在会馆里，这种会馆被人称为工商会馆，以别于那种旧日的同乡会馆。

北京的工商会馆在经济发展中，有其特殊地位，引起不少学者和专家的注意，《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李华编）就是极好的佐证。在这本书里，就有许多珍贵的资料，对于我们了解工商会馆的产生和发展有很大助益。如在介绍“颜料会馆”时说：“明中叶山西颜料、桐油商人创建，原名平遥会馆，又名集瀛会馆，后改为颜料会馆，清末民初，

改称颜料同业公会。”从这则资料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会馆——工商会馆——同业公会的过程及关系。

会馆有重要作用，故而各省商人争建，而且差不多都建在工商业繁荣发达的前门、崇文门、宣武门以南的地区，正如史料所云：“京师为天下首善地，货行会馆之多，不啻什百倍于天下各外省。且正阳、崇文、宣武门外，货行会馆之多，又不啻什百倍于京师各门外。”

工商会馆的建立，显然是各省商人为了团结、拉拢同乡，进行商业竞争而设，有很强的封建色彩和地域色彩，又有很强的排它性，帮会的特点很突出。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我国出现之后，已经不适应形势的发展，它的闭塞和保守，势必会阻碍社会进步和发展，它退出历史舞台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种势态下，工商界的同业公会出现了。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维新变法后新设的工商部上奏光绪皇帝和西太后：“劝办京城商会，并推广上海商会，将原设商业公所（即工商会馆等），改为商务总会，刊给关防（印信）。”二年后在前门外西珠市口，成立了“京师商业总会”，自此之后，各行各业相继成立了同业公会（简称商会）。如在光绪末年成立了绸缎洋货公会及油盐粮行公会、饭庄公会等等，连剃头、修脚、搓澡的，也在前门外小马神庙成立了“整容行公会”。

“同业公会”的宗旨是“联络商情，开通民智，求集思广益之道，讲维持保护之方”。在某种意义上还有“政治色彩”，因而，不少同业公会的头面人物，都有靠山。如“京师商务总会”的第一任“总理”是冯麟霈，他本是宝兴隆金店的店主，但又是“花翎四品衔候选知州”；第一任“协理”袁鉴，原来也是开金店的，后又入交通银行，他是“花翎三品衔补

用直隶州知州”。袁鉴的继任者丁浩，也有“花翎四品衔候选知州”的名分。这些官衔虽是虚名，但在当时仍然是十分显赫，使京师商务总会有了权威，说话、做事有了“政治资本”。

同业公会，除参加工商业的运作，进行协调外，还经常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和公益活动，这在其它国家是没有的。

民国之初，国内军阀混战，出现了“赵打钱，孙打李，赵钱孙李，谁都不讲理”的局面，每逢战乱，京城各行各业的内同业公会都要出来协调，或帮助筹集军款，或协助驻军维持地方治安。“五四”运动期间，各类同业公会也曾支持爱国学生，号召商界“罢市”。当然，同业公会也是被各派军阀敲诈的对象，当直系军阀在京时，商会要支持和提供部分军需军饷，当直军退出，奉军进入时，他们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也要如法泡制。总之，“官督商办，出钱方便”，不断出钱、出力。

同业公会在其存在和发展中，也曾干了一些有益于地方的实事。早年京城没有专业消防队时，商业会馆及同业公会便牵头成立了“平安公所”之类的组织，即“水会”，来帮助市面的消防工作。“水会”帮助救火曾有不少好成绩。光绪十五年，天坛祈年殿雷击失火，光绪十四年紫禁城贞度门失火，在这些重大火灾中，“水会”曾参与扑救，并因此得到皇室的嘉奖。贞度门大火后，参与救火的15个“水会”，“赏银一万两”，一些“水会”的“会首”也授予官衔，如“水会首事”沈永泉、于凤冈、蔡珍诸人均“交部议叙”；徐柜芳、范鸿逵“赏五品顶戴”；薛德祥“赏守备衔”。另一些“水会首事”则“赏六品顶戴”和“赏七品顶戴”等。此项封赏还载入了《光绪东华录》。这些“水会”头面人物，大多在工商会馆中担任